



佛教史研究文库

宗通与说通

吐蕃宗论的影响
与汉藏佛教亲缘关系



尹邦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佛教史研究文库

宗通与说通

吐蕃宗论的影响
与汉藏佛教亲缘关系

尹邦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通与说通：吐蕃宗论的影响与汉藏佛教亲缘关系/
尹邦志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佛教史研究文库)
ISBN 978-7-5097-5572-3

I. ①宗… II. ①尹… III. ①吐蕃-佛教史-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2507号

·佛教史研究文库·

宗通与说通

——吐蕃宗论的影响与汉藏佛教亲缘关系

著 者 / 尹邦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于占杰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于占杰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李 惠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72-3

定 价 / 268.00元

印 张 / 31.5

字 数 / 525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部分 吐蕃宗论与藏传佛教的形成

| | |
|-------------------|-----|
| 第一章 吐蕃宗论 | 13 |
| 第一节 宗论的起因：桑耶寺的香火 | 13 |
| 第二节 宗论的依据：中道佛性论 | 23 |
| 第三节 宗论的焦点：宗通与说通 | 48 |
| 第四节 宗论的性质：分宗立派的戏剧 | 71 |
| 第二章 吐蕃宗论与前弘期佛教 | 119 |
| 第一节 中印佛教哺育的“大圆满” | 120 |
| 第二节 旧译密法的宗通思想 | 130 |
| 第三节 吐蕃宗论的和会 | 143 |
| 第四节 判摄佛法的体系 | 153 |

第二部分 吐蕃宗论与后弘期佛教的格局

| | |
|---------------|-----|
| 第三章 戒律和密法 | 167 |
| 第一节 宗通法脉的传承 | 168 |
| 第二节 贬斥顿悟，借律扶教 | 186 |

2 宗通与说通

| | | |
|-----|------------------------|-----|
| 第三节 | 阿底峡道次第思想的形成····· | 195 |
| 第四章 | 瑜伽士与汉地佛法····· | 208 |
| 第一节 | 瑜伽士、班智达和后弘期的宗教格局····· | 209 |
| 第二节 | 噶举派的宗通法门····· | 213 |
| 第三节 | 冈波巴和禅····· | 231 |
| 第四节 | 宗通法脉的传承问题····· | 239 |
| 第五章 | 班智达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 245 |
| 第一节 | 萨班伯侄对汉藏佛教交流的贡献····· | 246 |
| 第二节 | 萨班对“汉地大圆满”的批判····· | 254 |
| 第三节 | 《大藏经》的编纂及布顿对宗论的评述····· | 281 |
| 第六章 | 汉藏教法的融通····· | 291 |
| 第一节 | 瑜伽士和班智达的集大成者····· | 291 |
| 第二节 | 宗说兼通的大圆满教法····· | 301 |
| 第三节 | 汉藏教理的融会····· | 318 |
| 第四节 | 为摩诃衍平反····· | 332 |
| 第五节 | 《五部遗教》与禅密融合的思潮····· | 336 |

第三部分 吐蕃宗论与宗派运动

| | | |
|-----|-------------------|-----|
| 第七章 | 格鲁派与“支那堪布遗教”····· | 343 |
| 第一节 | 提振戒律以护教····· | 343 |
| 第二节 | 依根本智而立破····· | 347 |
| 第三节 | 道次第思想····· | 359 |
| 第四节 | 对“支那堪布遗教”的批判····· | 368 |

| | |
|-------------------------|-----|
| 第八章 宗派的融合····· | 380 |
| 第一节 “和尚宗”：新旧教派的分界线····· | 380 |
| 第二节 晋美林巴的拨乱反正····· | 394 |
| 第三节 利美运动····· | 410 |
| 第四节 麦彭的“大中观”思想····· | 426 |
| | |
| 结 语····· | 439 |
| | |
| 参考文献····· | 442 |
| | |
| 附录一 菩提道灯论····· | 457 |
| | |
| 附录二 太虚大师为支那堪布翻案····· | 460 |
| | |
| 主题词索引····· | 471 |
| | |
| 主要人名索引····· | 489 |

绪 论

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① 八万四千法门、无数教派之间，或融通无碍，或针锋相对，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的戏剧。无数的风暴，彰显了精神世界的活力、魔力、魅力和佛力，推动了佛法的弘扬、文化的繁荣。公元8世纪末期在拉萨的唐、蕃、印僧人之间进行的大型佛教辩论，即是这些伟大的戏剧之一。国内学术界以前一般将其称为“吐蕃僧诤”，日本等国学者称为“吐蕃宗论”。例如，冲本克己写了三篇文章，标题都叫“桑耶宗论”。“吐蕃宗论”这个称谓更能反映事件的内涵，近年来逐渐为国内学界接受。这一事件在整个佛教史上非常独特。它聚集了当时中印佛教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寂护、莲花戒、摩诃衍等人，以及吐蕃的政治和宗教领袖赤松德赞、拔·塞囊、娘·定埃增等人，让他们围绕佛教的教理和修持实践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往复辩难，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佛学争论，成就了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这一事件，不仅对于兴起时的西藏佛教史，而且对于当时的印度和中国佛教思想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②

宗论所涉及的问题博大精深，千余年来一直引人瞩目，对人类智慧的启迪意义，实在是难以估量。它的影响，不仅跨过了强盛而短暂的吐蕃王朝，而且越过了整个后弘期，绵延至今。后弘期藏传佛教界对于它的讨论，热烈的程度、持续的时间、影响的深广度，较前弘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吐蕃宗论在后弘期的影响”这一视角，可以全方位地鸟瞰藏传佛教的整体情形，可为禅宗、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历史研究，以及汉藏关系、中印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参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①（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第14册，0538a。

②〔日〕冲本克己：《敦煌出土的禅宗文献的内容》，李德龙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第211页。

在讨论宗论之前，必须看到一部历史著作的影响，它就是《拔协》。对宗论的叙述，后弘期的藏文史学名著，如萨班的《显明能仁密意》、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蔡巴·贡噶多杰的《红史》、巴卧·祖拉陈哇的《贤者喜宴》、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等，都不同程度地复述了《拔协》的内容。但《拔协》的叙述是可疑的，这一点早在古代的西藏就引起注意。现代学者认为它把史实和传说杂糅，成书年代可能很晚。尽管石泰安相信吐蕃时期的僧统拔·塞囊是《拔协》的原作者，今枝由郎却认为它修成于14世纪，戴密微称它是“晚期和史料价值令人质疑的著作”^①。有可能书的某些部分是拔·塞囊留下的，代表了他的见解，但今天能够看到的版本经过了加工。戴密微指出，藏文古代史料都是印度影响最终在吐蕃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写成的，都充斥着神话传说的内容，敦煌千佛洞写本有关禅宗传入吐蕃的史料更为古老，更为丰富，更为真实可靠。^②借助敦煌写本，更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戴氏所著《吐蕃僧诤记》，引用敦煌文献，详细梳理、考证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传播的情况，对吐蕃宗论的研究结果与藏文史书的记载迥然不同。该书1952年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后，意大利学者杜齐、日本佛教学者冢本善隆、上山大峻、山口瑞凤、今枝由郎、小富宏允、原田觉、冲本克己、田中良昭、木村隆德等在敦煌文献的基础上作了广泛的探索，修正了他的一些论点，把吐蕃佛教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国内学者王重民、潘重规、饶宗颐、王尧、冉云华、吴其昱、佟德福、杨富学等人也在相关领域贡献了成果。目前，敦煌文献仍然受到藏学界的重视。

敦煌文献的确帮助人们搞清了很多细节问题。不幸的是，人们对于宗论的总体理解，仍然受到《拔协》的局限。举例而言，在敦煌文献方面很下工夫的日本学者，在宗论的研究方面的确成就斐然，然而，直到20世纪

① [法]戴密微：《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七辑），达摩多罗考，耿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第132页。

② [法]戴密微：《敦煌学近作》，耿昇译，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第1~109页。

末期，他们所叙述的吐蕃宗论，框架仍然与《拔协》相同。

20世纪后半期，随着一些藏文文献引起学界重视，逐渐有人从后弘期人们的态度来研究吐蕃宗论。这样的研究，戴密微、杜齐等人也曾经涉及，但不系统。国外的学者如 David Seyfort Reugg，国内学者如沈卫荣、班班多杰等人，都迈入了这个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成果。

从后弘期的视角来研究吐蕃宗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以前人们之所以对“宗论”印象模糊，是因为它出自后弘期学者的叙述。这就不得不让人们追问：后弘期的学者为什么关注这个事件？他们的叙述有什么背景、反映了什么样的史实？后弘期的主流叙事为什么与敦煌文献矛盾，它后面隐藏着一些什么东西？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后弘期的史籍、论典，在对待宗论和《拔协》时表现出明显的矛盾：重要的宗教领袖们不仅都对有关摩诃衍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且由此分出对立的阵营，这是为什么呢？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表明了“后弘期视角”对吐蕃宗论研究的价值不可低估。

要研究宗论在后弘期的影响，敦煌文献和其他汉文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是，更主要的还是要借助藏文文献。拜张炜明先生所赐，笔者得以拥有十多本未面市的相关汉译藏传佛教经典文献，借此可以揭示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由于近年来汉人之中的藏传佛教信徒越来越多，大量的经典、法本也随之译出；藏传佛教在海外传播，也通过外语的途径，输送了一些有用的信息，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当然，除了依据后弘期史料厘清前弘期的史实，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考察吐蕃宗论对后弘期的“影响”，则更有价值。因为，这一方面可以揭示宗论本身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可以以“宗论”为视角，鸟瞰后弘期的藏传佛教的发展。本书便采用这一视角，考察宗论在藏传佛教史上的作用，从而说明汉藏佛教的关系。

二

文献的充足既令人欣慰，也令人沮丧。借助敦煌文献，很多学者没有跳出《拔协》的窠臼反而深陷其中，不得不让人对过于依赖文献的学术方法感到怀疑。另一方面，“吐蕃宗论”这个藏学界的热点问题，人们在基本事实上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相继作了不少细节上的修订。本书的任务是谈

“影响”，是一个宏观的视野，它要求提纲挈领，而不是陷于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要对宗论中双方所涉及的各种艰深的教理问题归纳出要点，同时要在叙述它对后弘期的影响时显示出系统性。

宗教界讨论问题，包括宗派之间进行争论，无论怎样旁征博引、海阔天空，都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有所指归的。他们立宗，要么以经为本，要么以论为本，总是有所依凭的。这也值得学术界借鉴，从中提炼研究方法。宗派的不同——正如宗论之中摩诃衍所代表的禅宗和寂护、莲花戒所创立的中观瑜伽行派的不同，只是对佛陀所说的经典和修持方法的发挥不同，都奉行佛陀的教导则是相同的。从宗论双方留下的文献来考察，他们的说法其实有相同的经典和教理背景——以《楞伽经》为主的如来藏体系。而《楞伽经》的主题之一，是围绕“宗通和说通”来说明如何证悟如来藏。通常把吐蕃宗论称为“顿渐之争”，从留下的文献来看，当时讨论的内容的确如此。但是，双方赋予“顿”和“渐”的内涵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吐蕃宗论的内涵，也有助于梳理它在后弘期的具体影响，包括不同背景的人对此是如何解读的。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厘清。

从教理的角度来考察，无论是前弘期还是后弘期对宗论中的问题的讨论，都不可能像《拔协》所叙述的那样，有一个谁输谁赢的断然的结论。因为，佛教的经典是开放性的，它给在现实中修行的人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允许各个个体、宗派对教理和修行方法进行各有特色的发挥，允许百家争鸣。因此，禅宗和中观瑜伽行派、顿悟和渐悟，究竟谁对谁错、谁高谁低，在西藏已经讨论了一千年之后，再来一千年，恐怕也是没有结论的。因为，这样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无聊的。

没有输赢，为什么又要进行辩论呢？这里的意思是，没有最后的输赢，但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又非辩不可，而且每一场辩论都要做出结论，因为宗派的建立和传承不许淆乱。这又是吐蕃宗论持续千余年的魅力所在。“顿悟”和“渐悟”、“宗通”与“说通”，在整个藏传佛教史上以各种不同的问题为形式表现了出来。如前弘期的戒律和密法之别，一直延续到后弘期；而后弘期的班智达和瑜伽士、新密和旧密、分宗弘化和不分教派运动之间的互动，也反映了“宗通”和“说通”的关系。吐蕃宗论就像一个显微镜，有助于人们厘清藏传佛教的思想史线索，揭示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发展逻辑。这反过来又凸显了吐蕃宗论的内涵之深广。概括来说，吐蕃宗论影响了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发展格局。

在此之前，汉地也发生了“顿渐之争”。然而，它和藏地的“顿渐之争”所涉及的问题是不同的，影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在禅宗内部展开，关心的是修行中是否“安立净相”、“凝心入定”等问题，以“顿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名副其实的“顿渐之争”。后者在“宗门”和“教下”——禅宗与中观瑜伽行派之间展开，涉及的是以“修证”还是“经教”来判别佛法的问题，以“正理”作为标准，是“宗通”和“说通”之争。借此，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可以比较、区分。

藏传佛教的历史，古代藏族学者所写的，以宗派源流居多。当代藏学界的研究成果，则多以“社会发展史”的视角书写。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大体相同。本书围绕教理和修持体系的对立融合来叙事，在范式和材料上都是在尝试一种新的选择。当然，本书主要内容不是佛教史的叙述，也未必符合专门史的写作规范，只是一个研究性的尝试。

三

吐蕃宗论告诉我们，汉藏佛教的亲缘关系是从前弘期结下的。中印佛教，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父亲，藏传佛教是他们的结晶。汉藏佛教自古血脉相连，关系之深厚，非语言所能明述。它在后弘期的影响，又可以折射出这种亲缘关系历久而弥新，即使因为时空等原因，相隔千山万水，也是无法割断的。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贯穿在它的产生、发展的每一阶段。它不仅沉淀为藏传佛教的基因，而且影响了藏传佛教的格局；它所启发的问题和智慧，推动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这就是吐蕃宗论所折射出来的汉藏佛教亲缘关系的内涵。

根据《禅定目炬》，摩诃衍的传承在前弘期便终结了。但在后弘期的历史上，“和尚宗”、“汉地大圆满”、“支那堪布遗教”却赫赫有名，围绕着它展开的争论从未停止。仅仅从“问题”的角度，也可以说摩诃衍及其同时代的汉地大师们为藏传佛教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精神遗产。后弘期的发展逻辑中，“吐蕃宗论”提出的问题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它成为了藏传佛教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由于具有深广的佛学内涵，左右着人们的修行路线。因而几乎所有的大师都出来发言，形成了旷古绝今的的一场大讨论。摩诃衍和莲花戒虽然没有出场，但他们的形象却无人忽视。围绕这个主题在后弘期进行的讨论，就是汉藏佛教亲缘关系的见证者。这为我们研

究“汉藏佛教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不是从后弘期汉藏佛教界的互动、事件、传承，而是从藏传佛教的精神运动、历史逻辑的角度考察汉藏佛教的因缘。打个比方，一位母亲对儿子的影响，可以抛开母子关系中的一些事件，而通过儿子的成长观察出来。不能因为他们天各一方，就说母子关系就不存在、不显现了。

吐蕃宗论的影响具有丰富的内涵，这里谈四个问题。

第一，所谓的“摩诃衍遗教”，究竟是遗毒还是遗产？这在历史上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了，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谈宗论和摩诃衍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不妨先来看看莲花戒和阿底峡尊者的“道次第”的思想来历。他们两人分别是前弘期和后弘期的里程碑式人物。“次第”的观念在印度佛教中虽然存在，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影响。《阿含经》中，既记载了佛陀的某些弟子按照一定的次第修行的例子，也留下了大量弟子顿净法眼的事迹，却未见“次第”对教法体系的决定性作用。印度人没有像某些藏人那样把“次第”作为安顿教义的准绳，并因此而质疑“顿悟”法门。莲花戒和摩诃衍的著作中，分别特别标明“次第”、“顿悟”等字眼，无疑是有意识的行为。这种做法，除了各自的教派传承外，很大一个原因是针对藏人修学佛法而来的。因此，可以视为分宗立派的行为。莲花戒的“次第”思想又是怎么来的呢？《禅定目炬》中有一句话：“嘎玛拉西拉作《次第修习》等断除疑难，后来于阿闍黎不再跟随。”^①可惜这句话语焉不详。“阿闍黎”，根据上下文，应指摩诃衍。因而可以推测，正是摩诃衍的“顿悟”说启发、成就了莲花戒的“次第”观念，并使“顿悟”和“次第”在藏传佛教史上成了一对基本范畴，从此形成了顿、渐两派分立的格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摩诃衍所树立的“大乘顿悟”法门的旗帜的高度。

在印度，10世纪的阿底峡尊者出现以前，中观、瑜伽行派的经典作家中都没有人明确宣扬“三士道”次第的修行体系，包括莲花戒的“次第”观念在印度都几乎没有影响。当时的印度人自认为智慧大、很精进，有方便之说，无次第之规，以三士道的次第为基础的《菩提道灯论》这样的著

①（吐蕃）鲁钦·桑吉益希：《开显观修之要点·禅定目炬》（第一章），张炜明译，内部资料。在笔者写作该书时，尚未见到《禅定目炬》的汉译本出版。承蒙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先生惠赐藏文本，笔者请张炜明先生参照西南民族大学藏学文献中心所藏《嘎玛》中的藏文本，翻译了全书。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这一译本，不另注明出处。

作在印度不会出现。所以，他们把这部杰作归功于西藏人。^①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视角，去审视吐蕃宗论在后弘期的影响。换句话说，正是宗论在藏传佛教界普及了顿悟、次第的思想，为阿底峡尊者的这部著作准备了机缘。

仅从莲花戒、阿底峡的思想来观察，已经可以说，不管摩诃衍的思想是遗产还是遗毒，他对藏族文明都有不可低估的启迪作用、传承作用。其实，无论在前弘期还是后弘期，汉藏佛教的交流始终没有中断、停止过，即使批判“顿悟派”极其激烈的贡巴饶色、萨班、布顿、宗喀巴等人，也都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受益者和弄潮儿。总之，汉传佛教的部分内容是藏传佛教的有机组成。在藏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汉传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再次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极其富有生命力。

第二，对摩诃衍的态度，反映了藏传佛教界不同的宗派在教理和修行路线上的差异。也可以说，摩诃衍在影响着藏传佛教界对教理和修行路线的选择。这样也可以澄清一个误解：至今仍有不少人以为，藏传佛教就是讲次第的，汉传佛教是讲顿悟的，把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汉藏佛教各有自己的“顿悟派”和“渐悟派”。宗论中提出的修行问题和相应的教理问题，一直拷问着后弘期那些思考着佛教问题，或者实践着佛法的人，影响着整个藏民族的精神面貌。“宗通”和“说通”、“有修”和“无作”等问题，推动者各个教派的建设，同时推动着他们之间的争鸣。摩诃衍在雪域树立了大乘顿悟的旗帜，历史影响不能低估。“摩诃衍遗教”是藏传佛教界在后弘期面对的核心命题之一。

第三，吐蕃宗论对后弘期的宗教格局的影响。藏传佛教后弘期对摩诃衍的教法的讨论有一个特点，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宗教界的大人物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可以认为，宗论的影响是一个试金石，通过观察不同的人对它的态度，能够检测出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矛盾。不断地探寻着解决矛盾的出路，正是它的发展动力之一。结合上面的“问题视角”，“宗通”和“说通”这一对概念，可以作为理解后弘期藏佛教发展结构的一把钥匙。

后弘期初期大量史实中，在历史上得到较多书写的，是代表戒律、经

^① 第一世帕绷喀仁波切开示《第三世墀江仁波切笔录整理》，仁钦曲扎译，《掌中解脱》，内部资料，第74页。

教——“说通”一派的人物和思想。“后弘期”的界定，就出自他们的立场。戒律有兴衰，密法却一直在流传。“后弘”主要指戒律的后弘，而不是全部密法或全部佛法的再兴。鲁钦·桑吉益希、隆钦巴等人所主张的修行体系，以及他们为弥合汉藏教理之间的分歧而作出的贡献则长期受到忽视。只有当他们的思想得到全面的书写、重视的时候，藏传佛教的面貌才能全面揭示出来。另一方面，重视戒律的贡巴饶色、天喇嘛益西沃等人，都对戒律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都站在自己宗派的立场，对“顿悟派”和旧译密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是后弘期类似批判的滥觞。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比较重视宗派问题，主要是它的存在情况，以及相互间的见解和修持方法的分歧与融和。当然，重视宗派问题并不是要去铺排宗派发展的历史，因为研究总目标的限制，只能够进行一些粗线条的分析。尤其是从“宗通”和“说通”的角度，强调那些受到忽视的宗派的存在、传续、交流的情况。叙述宗派的发展状况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通过这些叙述，读者也能够看到藏传佛教发展的概貌，从而了解到宗论之中的两条对立的修行路线——宗通和说通，在后弘期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而明白宗论的影响。

第四，吐蕃宗论还为我们观察藏传佛教历史上的思潮变迁、宗教运动提供了线索。前弘期的佛教思潮分合的情况，人们关注不深。佛学学者霍韬晦甚至认为宗论是“禅密之争”^①，实际上，莲花戒等人不代表密宗，他们代表中观瑜伽行派。他们和禅师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吐蕃佛教界分宗立派弘扬佛教的情况。同一时期的吐蕃，莲花生、无垢友、毗卢遮那等旧译密法的祖师，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中印佛教都有传承，代表了宗派融和的潮流。因此可以说，宗论时期，吐蕃的佛法建立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思潮——分宗立派和宗派融和、三个流派——禅宗、大圆满行者和中观瑜伽行派，它们在当时都是举足轻重的。然而，人们在关注宗论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融和思潮，在研究吐蕃佛教时只强调桑耶寺对建立三宝的历史影响，这对理解吐蕃佛教是有妨碍的。

后弘期的佛教，仍然在宗派分化和融合中呈现动态发展的特色。对顿悟派、密法的批判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追捧，表明了与之对立的思潮的强大。

^① 霍韬晦：《禅与密——拉萨对辩所反映的文化问题》，《法言》1989年第1期，佛教法住学社。

对付“顿悟派”的办法是，不仅批判，而且忽视。阿底峡尊者入藏，肩负着平息戒律和密法之争的使命，可是，由于这种思潮的影响，他的宏愿只能部分实现。正是这股思潮的影响在萨迦班智达、布顿等人身上体现出来，才导致他们把噶举等派当做“摩诃衍遗教”来批判，导致瑜伽士和班智达的对立。这本身就说明后弘期的佛教并没有行走在一宗独盛的道路，瑜伽士和班智达两个基本的路线，在整个藏传佛教后弘期都是互相竞争、力图平衡发展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隆钦巴的伟大在历史背景上凸显了出来。隆钦巴集瑜伽士和班智达的成就于一身。他的教义与禅宗相通，而且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最为旗帜鲜明地为摩诃衍唱赞歌，讽刺摩诃衍的对手。同时，他又能够调和教派之间的分歧。因而，他的出现意味着佛教界前一阶段的矛盾的一种解决。本书对“顿”、“渐”内涵的判释，正是受益于尊者对“自然智”的论述。

然而，在他的身后，宗喀巴对摩诃衍进行了立场更加鲜明的、史无前例的激烈批判，使摩诃衍在藏传佛教界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受其影响，“摩诃衍”仿佛成为一个禁忌，连格鲁派的对手们也几乎言必批摩诃衍，只有极少人例外。各个教派也相继表态，与摩诃衍划清界限。这反映出，格鲁派出现后，藏传佛教的宗派问题更加突出。由于格鲁派的压倒性的势力影响，激起了不分宗派的“利美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背景下，透过各种批判，仍然可以看到不少人对“和尚宗”的热衷和坚持。不分宗派的运动，目的在于绕过宗派对立，保存各派的传承，为藏传佛教寻找更为宽广、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有利于化解藏传佛教的内部矛盾，使其焕发生机，也是汉藏佛教交流的新的平台。

以上四个问题，从“汉藏佛教的亲缘关系”的角度，可以归纳为“摩诃衍遗教的影响”。它在后弘期的不同阶段，又展现为以下作用：（1）后弘初期对藏传佛教的“启迪”作用——特别是对道次第思想的启发；（2）瑜伽士以宗通思想为他们的实践佛法的主要内容，所以，摩诃衍遗教、宗通思想对藏传佛教有“养正”的作用；（3）由于它所激起的批判，使班智达的“说通”思想蔚为大观，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4）它催生了藏传佛教历史上许多在佛教理论和实践上集大成的大师，为汉藏佛教的交流、融通产生了积极作用；（5）在藏传佛教的崛起过程中，它被赋予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促进了新思潮、新理论的产生；（6）它为未来汉藏佛教的进一步交流提供着不竭的动力，为寻找新的融通基础提供着智慧的

启迪。

“摩诃衍的遗教”所代表的汉传佛教的教义、教法，并没有阻止藏传佛教向印度佛教学习，但它却始终显示着汉传佛教的巨大魅力。就像父母给孩子留下的启示，始终指引着、教导着、激励着藏传佛教。

第一部分
吐蕃宗论与藏传佛教的形成